

“圣地”曲阜六大宗教及其关系模式调查报告

赵杰

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社会进入探索社会改革和发展模式的新一轮周期，“中国究竟要往何处去”的问题重新进入了思想文化界的视野。与此相关联，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的“文化反思热”和“宗教信仰热”。基于对宗教、文化问题的强烈价值关怀，中国学者从语言文学、历史、哲学、伦理学等学科方向不断推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问题的研究。同时，对于西方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的研究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然而，对于当代中国宗教的研究却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从研究进路上来看，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当代中国宗教问题加以客观、实证研究的学术成果，相对来说并不多见。

改革开放之初，思想文化界一方面大力推介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思想学术和宗教文化思潮，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和中国本土的思想、信仰传承加以认真反省和批判、反思。经过这样几十年的努力，一些学者猛然发现，中国的宗教文化“生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按照学术界一些专家学者的观察，如果可以把宗教现象比喻成一个活动着的、有生机活力、又有自己的生存逻辑的生态圈，那么，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正面临着宗教生态失衡的危险。一方面，学者们惊呼：基督宗教这种外来宗教在中国大陆已经是“一教独大”！另一方面，学者们惋惜：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国本土的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和教派）作为“四旧”、“封建迷信”、“妖魔鬼怪”和“反动落后的东西”被打扫得过于“干净、彻底”！还有一方面，学者们呼吁：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的统一指导下被排挤到边缘地位的中国传统教化系统——主要是儒学-儒教传统，应该在中国大陆恢复其重要地位！

作为古典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在考察西方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发现新教伦理（特别是基督新教中清教徒、加尔文宗的宗教伦理观念）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主要精神动力，因此提出了著名的“韦伯命题”。然而，中国社会转型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格外复杂的局面。很显然，作为外来宗教的**基督宗教**、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佛教、道教及各种民间信仰和教派**、以及长期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地位的**儒教**，作为三套有区别的信仰系统，其所承载的价值理念、所表达的终极精神关怀、以及各自所催生的职业伦理观念，都会有所不同，甚至有时候会表现得背道而驰。要如何处理这三方面之间的关系？笼统地说，

*赵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宗教生态研究：“圣地”曲阜宗教生态现状、特点及其成因分析》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文号 11JJD730005。项目负责人：赵杰、马广海。课题组主要成员：陶冶、高永贵、林瑜胜、李建宇、于伟壮、武志伟、周源、蒋爽、谢丁坚。

有相当多的学者给出了如下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应该采取措施有效遏制外来宗教的“过速”增长、给民间宗教和教派洗脱“污名”、支持和支援儒学-儒教复兴。就实际操作来说，我们发现，学者们的有些建议已经成为政府部门管理宗教事务、调整宗教政策的部分依据。当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和宗教政策究竟应该往什么方向走，学术界的意见并非铁板一块。各种意见和建议之间的分歧，在近几年有关中国宗教文化生态平衡（抑或是失衡）问题的争论中得到了充分表达。

对于当代中国宗教文化生态的现状，另有来自国际社会的观察报告：目前的中国已经由老三教（儒-释-道）作为统一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本的时代，进入了新三教（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西方自由主义）分头挺立、争夺和竞争作为中国核心价值观念体系的时代。有证据表明，在所谓新三教的格局中，马克思主义占据着绝对优胜的领导地位，而实际情况，可能要比表面看起来的情形复杂得多。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号召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事实上在中国基层社会有着广泛的基础，支持儒学-儒教复兴，甚至在宽泛的意义上支持中国本土儒、释、道三教“做大”、“做强”的大有人在。另外，以“自由、民主、平等”（以基督宗教《圣经》的“创造秩序”为基础，以哈耶克所说的“自由秩序”为框架）为价值标的的西方宗教、文化传统，据实而论在中国社会也绝非没有“市场”。尤其是当“美国模式”与“中国模式”成为当代中国人思考和研究社会改革和发展问题，以及社会生活当中各种复杂问题的对比性标准时，许多中国人对美国模式中的西方价值表达了高度的认同。当代中国将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及西方传统的人权观念，这三套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社会观察和关注中国的一个新的焦点。同时也成为考察和检验中国社会政治智慧和社会团结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说，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作为一个社会的精神资源和灵性资本，确实能够为社会生活提供道义的、伦理的、甚至是神圣性的支持和支援的话，那么，在当代中国，能够为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精神支持和灵性资本的宗教文化传统是什么？按照韦伯命题的逻辑，在宗教、文化选择问题上，中国将何去何从？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大问题！如果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确实实现过老三教的生态平衡——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一直存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印象，对于“三教合流”这样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迄今为止仍为大部分中国人所津津乐道。那么，今天在新三教，甚至是更多宗教、文化参与竞争的复杂情况下，要如何实现新的宗教生态平衡？相信这不仅是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是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十分关心的现实问题。

2010年发生在孔子故里的“曲阜建堂事件”，作为一个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要新闻

事件，为我们思考和研究当代中国宗教生态问题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按照学术界的观察和判断，“曲阜建堂事件”并非是基于不同群体间的现实利益而引发冲突的“维权事件”，也非挑战政府权威的“政治事件”，而基本上可以定性和定义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次“社会文化事件”。正是此一事件，激发我们对“圣地”曲阜各大宗教的生存现状及其关系模式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

据观察，普通民众和社会各界对于在“圣地”曲阜建造基督教“圣三一”教堂的反应，基本上分为三类：反对派、支持派、中立派。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圣地”曲阜的宗教关系及当代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既不是要对某一种或某几种宗教表达支持或反对的态度，也不是要为排斥和打击某一种或某几种宗教提供所谓“学理”的依据，甚至也不应该是简单的、短期的对策性研究。这是由社会科学研究性质所决定的。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性要求和科学工作者的职业操守，本课题试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框架中，借助社会科学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宗教生存及宗教文化生态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之上，为中国社会合理、理性地处理各种宗教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提供学术资源上的支持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依据。同时为政府主管部门提供关于文化发展战略和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思路借鉴。

2010年12月22日，在十个儒家社团及十个儒家网站的支持下，儒家十学者联名签署并发表反对在“圣地”曲阜建造基督教教堂《意见书》，同时开放征集海内外社会各界人士联名支持。将近一年后的2011年9月18日，曲阜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向全国“两会”写信求助，请求全国两会出面协调，尽快恢复曲阜“圣三一”教堂的建设。

从两份文件的措辞方式，可以看出，儒学十教授是主动出击方，曲阜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被动回应方。截止到2014年6月，曲阜“圣三一”教堂的建设仍然处在“无限期停建状态”。

儒学教授公开发表反对建堂“意见”三年来，曲阜建堂风波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学术界的争吵和批评、反省也渐渐趋于沉寂。但是，遗留下来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对于曲阜建堂事件，曲阜社会各界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曲阜政府部门怎么样对待和处理此事？建堂事件能否影响曲阜政府部门和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曲阜学术机构和民间学者怎么样看待此事？曲阜当地的普通民众对此事持怎样的态度？除了基督教会，曲阜当地的其他宗教对此事有无反应和对策？建堂风波是否会影响曲阜各宗教间的关系？另外，在日常生活状态中，曲阜的基督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的宗教和教派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它们如何与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处理关系？各宗教之间有无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

那么这种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就各宗教内部事务而言，曲阜的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民间宗教是如何经营宗教生活的？它们与三孔文化及儒学-儒教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我们于2012年7月正式启动了对曲阜建堂事件及曲阜宗教生态的田野调研工作。截止到目前，较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工作已经进行了四期。另外还有数次短期、零散、少数研究者单独进行的调查活动。调研工作虽然艰苦，且多遇挫折和困难，但是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所积累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极具研究价值，我们将对此进行谨慎、严肃的科学分析，以期得到一些经得起检验的研究结论。

一、曲阜的“三孔”文化及儒学—儒教

曲阜市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曲阜现有总人口约64万，其中孔子后裔约占到五分之一，约13万人左右。孔子被尊为“至圣”，他的故乡曲阜也自然地被视为“圣地”。自汉高祖刘邦开亲祀孔子之先河后，自汉至清有10余位皇帝先后到曲阜祭孔达19次，遣大臣代为恭祭达196次。历代文人学士来曲阜孔庙朝圣者，更是数不胜数。

曲阜既以“圣地”著称，曲阜的公共生活亦确实围绕“孔子—儒学—儒教”而展开。从曲阜的城市布局来看，孔庙处于整个曲阜市的正中心，外加孔府、孔林，构成曲阜以“三孔”为主体的城建格局。作为一个县级市的曲阜，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是一个围绕孔子—三孔而建构起来的体系。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孔子历史性地位的改变和提升，“三孔”在曲阜的地位也得以改变和逐步提升。围绕“三孔”展开的祭祀、纪念、旅游、文化、学术、政治活动逐年升格，直至大型“孔子文化节”2005年实现地方政府与中央电视台“对接”，进而于2010年举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述活动升格至国家、中央政府的层面。那么，这一切究竟给曲阜带来了什么？按照曲阜乃至济宁市政府的初衷，自然希望这一切能大大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是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以“三孔”为主题的活动规格越升级，那么曲阜的财政、经济负担越重。这里引用当地一位重要学者的话说：曲阜这匹小马实在是拉不动这辆大车了。当地一位正局级官员也用了“不堪重负”四个字，概括目前曲阜的发展困境。

其实，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我们更加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孔子—儒学—儒教”在曲阜的宗教生活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在曲阜，确实有作为宗教的“儒教”存在吗？或者说确实有一个信众群体在追求宗教需要满足的意义上信仰和实践“儒教”吗？

无论如何，若说“孔子—儒学—儒教”在曲阜当地没有什么影响，这绝对不符合事实。关键是在哪些方面有影响。据我们观察，在曲阜当地，“孔子—儒家”似乎可以分作两个系统来考察：一是孔子—儒学作为思想学术系统；另一个是孔子—儒教作为崇拜和祭祀系统。

孔府作为孔子嫡裔、“袭封衍圣公”办公和居住合一的场所，其在曲阜宗教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非常值得研究。历代袭封衍圣公作为朝廷任命的孔子奉祀官，不但专门负责按节令、时期祭祀孔子，还会专门负责接待来自朝廷和地方上至皇帝、下至各级官吏来曲阜的朝圣、祭孔事宜。另外，在曲阜还设有孔族衙门，很多朝代的县令也由孔府人出任或举荐。那么，孔府所主持的祭孔活动有否成为曲阜当地人宗教生活的一项内容呢？首先，孔府内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佛堂楼，引起了我们重视；其次，孔府作为曲阜的大户，历朝历代的衍圣公都很热心在曲阜境内建立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的活动场所。这或许能说明，祭孔对于孔氏族人和当地百姓来说，至少不是唯一的宗教生活内容。事实上他们在祈福禳灾、安顿生死祸福、祈求神佑、求赐子嗣等具有**典型宗教意义**的生活中会自觉地到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中寻求帮助。

依托曲阜师范大学，尤其是 1996 年国务院中央办公厅【66】号文批准在曲阜成立的中国孔子研究院（正厅级单位），以及最近成立的尼山圣源书院，的确集结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推动曲阜当地、带动全国乃至世界对于孔子儒家思想的深入研究和系统推广。这批学者重视对儒家已有经典的研究；强调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言谈中甚至时常不自觉地吧儒学径直当作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同时强调儒学并非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儒学并不迫人入教，也不刻意组织信众，而是以孔子儒家思想作为个人人生、及社会公共生活的至高准则加以遵守。既然如此，那么孔子—儒学一系，在曲阜所扮演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卫道”者的角色。

在曲阜活跃着的，还有另一支力量。曲阜当地有一位民间尊孔人士（崇尚和推崇“国学”），早年怀着为儒学培养基督教牧师一样的传道（教）人的心志，办起了曲阜书院。到 2010 年时，这位令人尊敬的人士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当地民政部门成功注册了“曲阜儒者联合会、曲阜国学院”，并招收到了第一批全日制学员 18 名。作为非营利性社会办学机构，曲阜国学院除了聘请专职和兼职教师教授儒家经典外，还以孔子的“六艺”作为主要教学科目。特别是教导学员学习各种“祭孔”礼仪。据介绍，2005 年恢复国家祭孔以前，民间祭孔活动在曲阜已经存在了好多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尊孔人士陆续自发地向圣地曲阜聚集，举办以祭孔朝圣、读经分享、结交师友为主的一系列活动。2005 年以后，民间祭孔不再享受优惠条件，官方祭孔也越办越大。有时，官方祭孔会请民间祭孔人士撰写祭文。曲阜国学院的同

学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曲阜当地及全国各地的孔庙（文庙）祭祀礼仪。所以，曲阜国学院的学生好像“不愁找不到工作”。那么，每年数度举办的大大小小的祭孔活动，其意义何在呢？我们走访曲阜当地民众，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祭孔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没啥大关系！我们问，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当地老百姓不是信孔子、信儒教吗？他们的回答令人震惊：儒教又不是宗教！祭孔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的事。跟老百姓无关呢！

经过访谈得知，在曲阜活跃着的“孔子—儒家”的这两支队伍，都十分崇拜和敬仰孔子，但都不太会视儒学—儒教为“宗教”。区别是：孔子—儒学一支对“宗教”更反感，也更多避讳。不愿意儒学跟“宗教”扯上关系。而孔子—儒教一支对“宗教”的态度要温和得多，尤其是对于中国本土的佛教、道教、民间信仰，都不会采取激烈批评的态度。也更愿意公开承认，祭孔和祭祖都是儒教的重要内容，但不认为祭祀是宗教生活的全部意义，可以接受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作为补充形式。

二、曲阜六大宗教生存现状

（一）曲阜的民间宗教

查阅《曲阜地名志》，我们发现，“文化大革命”之前，曲阜可谓是乡乡有庙宇、村村有祠堂。改革开放以后，曲阜市文物部门组织的一次历时一年多的“曲阜乡村庙宇考察”印证了志书中的记载。分布在曲阜乡村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庙宇，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无疑承担着满足乡民宗教需求的功能。伴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整个在世岁月的祭祀、敬拜、祈求、许愿、还愿活动，大概都离不开庙宇。乡民日常生活的内容简单质朴，大而化之地说，无非是迎生送死、祈福禳灾、祭祀亡故、敬拜神灵。在一般观察者的眼中，在乡村庙宇进行的宗教活动，笼统地称之为民间宗教，有时亦称作民间信仰。如果你问，曲阜乡村有多少民间宗教的信徒？那么可以回答说：过去曲阜乡民几乎个个都是民间宗教信徒。虽然经历了重大社会变迁，民间宗教因政权更迭及文化更新而遭遇重创，一度在地面上“消失”。但是，历史的记忆并不容易彻底抹去。事实上，那些埋藏在乡民心中的宗教经验，一旦遇到外部合适的条件，就会慢慢浮出地面。一方面来看，庙宇倒了、毁了、被砸、被弃，乡民的宗教记忆却还在；另一方面来看，乡民心中只要还存在宗教需求，那么条件允许时，庙宇可以重建、神灵可以重塑，信仰生活可以重新来过。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考察曲阜各大宗教的生存状况，就似乎有理由把民间宗教看作曲阜的第一大宗教。由此，便有了平常所谓“五大宗教”之外

的“六大宗教”^①的说法。其实，关于第六大宗教的说法，也不是我们课题组的创新。在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中国宗教》蓝皮书中，已经把“民间宗教”单列出来，事实上便有了中国六大宗教的分类和处理方式。

据记载和考察，曲阜的乡村庙宇，大多兴建于宋、明时期，毁于上世纪的“四清运动”与“文革”期间。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四期进入曲阜进行田野调查，对于曲阜的民间宗教的生存状况，掌握了比较详实的资料，支持我们做出如下报告：1、民国以来，曲阜乡村的宗教生活逐渐出现“分裂”的现象。在基督宗教进入曲阜以前，一个村子里的人，围绕村中庙宇、祠堂集中表达的民间宗教信仰，几乎是一种“整体性”、“群体性”参与的宗教行为。之后的“分裂”，首先表现为，部分村民进入了其他宗教信仰系统：像基督教、天主教这样一些外来的“建制性”宗教，作为宗教选项，进入了村民的宗教选择之中。这就意味着，在曲阜农村，确实有民间宗教信徒“流失”的现象。2、在田野调查中，我们未曾发现曲阜乡民供奉孔子像和祈求孔子保佑的现象。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规模不等的祭祀孔子活动，似乎与曲阜乡民的宗教生活没有直接关涉。曲阜乡民并不把孔子列入能够赐福禳灾、保佑平安的“神灵”行列。祭孔、奉祀孔子，从大的方面来说，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有某种关联，政治领袖们从“至圣先师”孔子那里获得某种治国安邦的道德资源的同时，或许也能得到一些宗教需求的满足，但是，普通民众却很少有机会到孔子、孔庙当中去表达宗教信仰，或者认为有需要到孔子、孔庙那里寻求宗教满足。从小的方面来看，祭祀孔子作为孔府后裔的家族内部事务，对于孔氏宗谱中的核心成员来说，当然具有祀奉先祖、祈求先祖之神灵护佑后人的宗教意义。然而，我们发现，即便是对于孔氏族人来说，祀奉孔子也不是其宗教生活的全部内容。事实上，在“袭封衍圣公”办公和居住的孔府，建有一座“佛堂楼”。另外，史书明文记载，衍圣公常常出资在曲阜周围的山上以及个别村庄主持和修建碧霞元君殿等道教和民间宗教庙宇。在祈福禳灾、迎生送死、祈求子嗣的日常宗教生活中，孔子后裔也会同曲阜的普通民众一样，求助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的众神灵。3、1982年以来，虽然曲阜乡村没有重建乡村庙宇，但有证据表明，曲阜的民间宗教仍然具有一定“活力”，或者说正在恢复活力。这主要表现在，失去了乡村庙宇的曲阜乡民越来越习惯于到佛教寺院和道教宫观中表达其民间宗教信仰。在最近三十年得到复建的佛教、道教活动场所，各种民间宗教信仰的神灵齐聚一堂，佛道不分、佛、道与民间宗教不分，更有甚者，基督宗教所信仰的神也有混入到曲阜

^①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一直有“五大宗教”的说法。民间宗教因为各种原因，至今未正式列入国家宗教事务统一管理的格局。宗教学作为独立学科兴起以来，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发现，民间宗教的定性、定义问题，对于民间宗教的管理问题，是一个亟待处理的问题。于是，近年来便总有学者主张，把民间宗教单列成类，与惯常所谓“五大宗教”并举。

佛、道教活动场所的现象。4、如果按照节期性参与民间宗教信仰活动的信徒人数来看，曲阜的民间宗教由于人数众多，仍然有能力参与到当地的宗教竞争中，从而扮演重要的角色，或者说，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5、只是，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由于宗族式的家庭结构不复存在，民间宗教信仰活动越来越缺乏“组织性”。在今天的曲阜并不存在任何形态的民间宗教组织，为信徒的信仰生活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和宗教教义和仪轨方面的训练和限制。乡民一般都是按照历史记忆和乡俗民风到宗教活动场所自发表达宗教信仰。6、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曲阜乡民的民间宗教信仰由于不具备关于神灵的体系化教义，又无民间宗教组织出面教化和指导乡民的民间宗教信仰，因此，曲阜民间宗教基本上不具备“伦理性宗教”的特征。相反，曲阜乡民的民间宗教信仰更像是韦伯所谓的“巫术性宗教”。这倒也不是说，“巫术性宗教”毫不具备伦理教导的因素。只是，与基督宗教和佛教那样一些“救赎”宗教相比，民间宗教没有一整套相互配合的伦理观念体系支持和指导民间宗教信仰者的日常生活。而依靠一点零散的善恶报应、因果循环观念，不足以支撑民间宗教信徒与其所信仰的神灵之间建立持久稳定的信赖关系。亦不能支持信徒在祈求未果（解释为神不灵验）的情况下，继续其奉献性和牺牲性的宗教行为。7、在曲阜民间宗教信仰中，未曾发现有“殉教”方面的事例。民间宗教所信仰的神灵，在信徒们看来确实具有赐福禳灾、赏善惩恶的能力，然而，在民间宗教的“经验”中，基本上没有“忠诚”委身于某些神灵，而得“福报”的传说。换一句话说，民间宗教信仰并不刻意要求信徒对神灵的“委身”，而毋宁说更加看重对神灵的“进贡”。8、因此，经常变换其所信仰的神灵，是曲阜民间宗教信徒信仰生活的常态。按照精打细算的“进贡”和“回报”逻辑，在信徒基于现实可见利益考量的基础上，民间宗教中的某些神灵很容易被信徒冷落，乃至抛弃。

（二）曲阜的道教

道教是我国本土的宗教，东汉时形成，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到南北朝时盛行开来。在曲阜，唐、宋、明时期道教较为活跃，遗迹不少，有白鹤观、景灵宫、玉皇庙、玄帝庙、三官庙、东岳庙等。

在曲阜境内广泛分布着的玉皇庙、天齐庙、玄帝庙、三官庙皆属于道教系统。道教既属于中国本土自生自长的宗教，那么，其与同样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民间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和复杂。事实上，道教与民间宗教极难避免这样一种混杂现象：道教与民间宗教在其所祀奉的神灵谱系问题上，经常是混淆在一起的。在中国，似乎很难将道教所信奉的神灵与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神灵作出严格区分。就万神殿中多神信仰的基本特点来看，神、灵、

鬼、怪以及各种超自然势力混杂在一起，若无特别的教义、教理支持，关于这些混杂一处的众神灵，在信徒们的眼中，虽然亦有等级高下之分，道行高低之别，但更重要的区分却是众神灵的“职司”分野。无论是道教，还是民间宗教，很少有犹太—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中的那样一位“全能”上帝的观念。换句话说，万神殿中的众神是各有职司、各有分工的。这样一种“功能神”信仰，决定了道教和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神灵可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时都可以往里添加，也可以用更具能力的神灵取代那些表现“无能”的神灵。从曲阜道教与民间宗教的这样一种关系来看，二者似乎注定是一荣俱荣，一衰俱衰。今天，在曲阜境内的典型道教宫观，已经不多见。^②保存最完整的当属九仙山道教建筑群落。我们调查发现，曲阜九仙山的道教活动呈现出明显的“节期性”特点：平时的九仙山极其冷清，庙会时的九仙山则宗教气氛十分浓烈。曲阜民众平日积攒的宗教热情似乎就是为了在这个节期迸发出来。

2012年7月26号，我们课题组一行三人专程开车去了一趟曲阜九仙山，对于九仙山宗教建筑群落——山脚处的红门宫奶奶庙、观音庙、财神庙，半山腰的三清宫、山顶的碧霞元君祠，进行实地考察。

九仙山宗教建筑群，那天只有红门宫奶奶庙有人看管，一位中年妇女负责接待和安排奶奶庙进香，另有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人负责日夜看管庙宇，据说是文物局每月付800多块钱工资雇佣的。平时很少有人来九仙山，庙里更是冷冷清清。半山腰和山顶的庙宇都关门落锁，偶尔看到石级两侧有丢弃的酸奶盒、矿泉水瓶，但我们在山上停留的三个多小时期间，只发现一个游人，很像是当地人上山锻炼身体的。

九仙山道教建筑群平日之衰落、冷清，令人唏嘘不已。更令人诧异的是，在半山腰的石级一侧有一个很像是茅房（学名卫生间）的简陋建筑（没有顶棚），靠近一看，里面供奉着财神和王母。还有一处，在两棵树底下，分别用两个小小的神龛供奉着财神和观音，都写有“心诚则灵，有求必应”的对联，神像前放置小小的香炉，里面有几根细细的香，东倒西歪的。还有，作为道教重要活动场所的三清宫，根本就是一座空房子，大殿的地上满是鸟粪，显然鸟儿在此找到了栖息处。墙上贴着三尊神像，靠近神像的地面上摆着一个又小又破的供桌，还有一个破烂“功德箱”。按照当日印象，曲阜的道教衰落，超乎想象。

2013年4月12日（阴历三月初三）我们课题组一行四人再去曲阜九仙山。曲阜九仙山“三月三”庙会是观察研究曲阜道教及民间宗教信仰的重要环节。据记载，九仙山庙会于1669年（康熙八年）由孔子后裔袭封衍圣公（第67代）孔毓圻创始，此后一直很兴盛。

^② 据当地人回忆，曲阜城西关大街上的玉皇大庙，曾经香火鼎盛。文革期间被拆除，住庙道长不知所踪，落实宗教政策后，并未启动重建。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庙会一度中断。1982年落实宗教政策后，各地庙会陆续恢复开放，九仙山庙会就此得以恢复。

去曲阜的路上，我们还在猜想，曲阜九仙山庙会很可能属于地方政府推动的“民俗文化旅游商贸活动”，在当地宗教生活中未必扮演重要角色。

一整天的考察下来，我们注意到九仙山庙会有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改变了我们之前的判断。

1、九仙山门票和庙会集市：

2012年7月26日，我们第一次驱车前往九仙山考察时，景区的门票是每位18元。这次庙会期间门票不升反降至每位5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济南的千佛山庙会恢复开放的十二年来，在社会各界呼吁降低门票的压力下，千佛山公园管理处不为所动，庙会期间门票仍为每位30元，进去后的几个主要景区还要另外收费。

我们注意到，前来九仙山赶会的村民一般是径直上山，在集市上逗留的不太多。集市商贩供应的商品品种比较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个自称来自河北道协的人出售各种小工艺品（大多与宗教信仰有关，有观音像、佛像、十字架等）的摊位。其出售物品分为10元区、20元区，两个区位各摆放了“免费开光”的牌子。我们在他的摊位前停留了十分钟左右，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开光道士”的生意是满集市上最火的。^③

2、摄影大赛、戏剧演出

三月三那一天，我们在九仙山庙会上所看到的唯一一项有公权力参与的活动，是在山下广场举行的摄影大赛颁奖仪式。另外，在广场一侧，庙会上的戏剧演出扎了专门的戏台子，但没见戏台前有多少观众。

3、成群结队的登山香客：

九仙山上的第一个重要宗教场所是山脚的**红门宫**。红门宫是一个不大的方形院落。迎门正殿主要供奉九仙奶奶（碧霞元君）。西侧殿供财神，东侧殿供观音。三月三这天，来到红门宫的香客一般先在院子的空地找一个角落，拿出事先买好的香和纸，一部分叠成元宝（元宝里面一定要塞东西：香纸、或折断的香头），另一部分打成“冥币”（跟清明节上坟的时候所用冥币一样）。在叠元宝、打纸的时候，村民们一改平日家长里短、谈东论西、嬉笑无状的做派，态度变得非常严肃认真，表情专注而清静。焚香、烧纸、磕头的样子也很专心。管理人员对于进殿参拜的人时有指导，一般香客都会很认真专注地听，很少询问，更不会反驳。

^③ 这位“道士”身穿紫色道袍，滚蓝色边，袍上有很醒目的八宫卦图。戴黑色道冠。35——45岁的样子。道士负责祷告开光，另有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负责收钱。我们问，十字架要开光吗？“道士”说，十字架不用开光，它是另一路的。当我们去买十字架付钱时，那位妇女把十字架拿给道士开光，道士多少有一点嗔怪地说：十字架不用开光！妇女没有多言。

上午九点钟左右，香客们从四面八方先涌到红门宫。管理人员介绍说，上午十点左右，红门宫进香会达到一个高潮。据粗略观察和询问当地人，三月三庙会期间每天上山的香客平均在七、八千左右，有时可能会过万。在红门宫进香后，香客们一般不会折头下山，而是背着香、纸继续攀岩上山，直到山顶的碧霞元君祠。上山途中还有几个小的殿宇，一般香客是见庙就进，见到神像就烧香磕头。如果遇到已经从上上下来的香客，相互打招呼一般都是这几句话：到顶了吗？到了。烧香了吗？烧了。磕头没？磕了。

在登顶的香客中，我们遇到三位 80 岁以上的老人。其中一位 85 岁的老太太，来自曲阜董庄。据亲属说，这位老太太年年庙会都来九仙山敬香，前几年还会去泰山上山香。老太太沿途愉快地与陌生人交谈，在众人的羡慕和称赞中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地直登到山顶的碧霞元君祠。另外两位老人的身体没有这位 85 岁老太太好，需要亲人搀扶上山，但也都到了山顶。下山途中，我们遇到一位年轻妇女怀抱一个大概不足周岁的孩子，这应该是当日最小的“香客”了。香客中也有不少穿着比较入时的年轻人，大多是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当日香客的主力是中年人 35—60 岁左右。这些人一般是夫妇结伴同来。

在登山途中，无论是熟识的，还是陌生人，都可以很自然轻松地交谈。尤其是遇到那位 85 岁的老人家，大家都会询问她的年龄，然后充满羡慕地赞美一番。老人家听到询问和赞美，高兴地笑着，表情很是愉悦开朗。途中还有人讲起传说中九仙奶奶当年用馒头、稀饭救八路军的神迹。很像是基督教圣经中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众人的记载。

其实，对于上山途中各大小庙宇供奉的神灵，香客们并非都知道的很清楚。经常听到询问：那殿里是什么？回答：“不知道，过去拜一拜吧”。

登顶途中看到一个牌坊比较醒目，上书：拨云观（繁体字）。牌坊后面有一个很小的房子，写着“王母行宫”。门前右侧有几个纸箱子，还有一个卖纪念品的小摊位。我们问十字架多少钱？回答 6 元。问：十字架作什么的？回答：都一样！都是辟邪的！他指着摊位上所有的东西说。

庙会期间，我们发现，这间小小的“王母行宫”里住着一位道士。他自称姓王，63 岁，在这个王母行宫已经住了十年。王母行宫门前栽了一棵桃树，枝叶并不十分繁茂。当日，王道士一边应酬着进王母行宫烧香的人，另一项“工作”便是阻止下山的香客折断门前的桃树枝。王道士有时很严厉地呵斥香客们不懂山规，责问折桃枝的香客：折断你的胳膊你愿意不？拧下你的头你愿意不？还威胁说要罚钱。几经劝说无效，还是有香客继续折桃枝。突然间，王道士从王母行宫冲出来抓住了一位正在折桃枝的年轻女子的胳膊，非要罚她 100 块钱不可。女子红了脸说，俺知道错了。王道士嘴里不停嘟哝着不懂山规之类的话。还说，有些话

我不讲，我讲了你所有拜的都作废。据我们理解，王道士的意思是，他如果狠心一点，就会讲一些诅咒人的话，可是他并不愿意说。王道士进出王母行宫期间，嘴里偶尔嘟囔说他快没有吃的、喝的了，这就要断顿了。

如果你问曲阜有多少道教信徒？恐怕很少有人给出确切的数字。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目前曲阜的住观道士屈指可数。正如曲阜道教协会的一位领导人所说，曲阜的道教亟待拯救。否则，会有消失的危险。一方面，道教可能会被民间宗教信仰的“海洋”所吞噬；另一方面，也可能在与基督教这种建制性宗教的竞争中被打败。这位道协领袖的建议是：让曲阜的道教和佛教联手，通过加大投入整修佛、道教寺院、宫观，吸引佛、道教神职人员入驻曲阜，加大佛教与道教经典的出版发行、注释讲解和传播宣传力度，以促进佛、道教在曲阜的共同复兴。这位道协领导人亲力亲为，近年来策划和复修了曲阜西关的一座小型碧霞祠。

（三）曲阜的佛教

曲阜佛教起始于魏晋，兴盛期据零散的文献记载，应在唐、宋、明时期。清代时，曲阜境内有寺院、尼庵 10 余处。现存并沿用至今的有石门山的石门寺。

石门寺，始建年代较早，宋、元时为全真观，是道教场所，与峰山道观同为一体。明景泰七年（1056 年）归佛教僧家所有，改称玉泉寺，后依山名改为石门寺。

与曲阜“三孔”文化景观的蔚为大观相比，曲阜的佛教的确是不太成气候。据说，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曲阜不佛”的说法（出处已不可考）。1982 年落实宗教政策后，曲阜当地有热心佛教的人士，极力推动曲阜的佛教发展，所构想的技术路径是：先到全国各地“招募”有影响的佛教僧侣入驻曲阜，继而推动曲阜当地的佛教寺院建设。芦斗寺是目前曲阜正在建设中的一处佛教场所。

2010 年元月 10 号，经曲阜市、济宁市宗教局批准，芦斗寺正式奠基重建。至 2012 年时，已建成大雄宝殿和藏经阁（藏经阁目前还没有藏经），主体建筑很漂亮、有风格、韵味独特。山顶的缅甸玉观音像也很庄严神圣。主殿斜上方先期建成了几栋仿宋式别墅。据介绍，芦斗寺目前有住庙僧人三位。一位住持方丈，另外两位负责看管大殿和其他事务。2012 年 7 月 26 号那天，我们在芦斗寺只见到一位看殿的僧人，30 岁左右模样，自称东北人，来自青岛湛山寺，法号行如。行如师傅介绍说，芦斗寺属佛教密宗，奠基仪式上发布的文字和图片资料表明，芦斗寺供奉“药师佛”，据说，药师佛和弥勒佛分属于佛教的两大法门。

2013 年 4 月 23 日，我们课题组一行四人第二次来到建设中的曲阜芦斗寺进行实地考察。进寺之前，碰到一位承包芦斗寺建设工程的负责人，他告诉说，因为资金极其困难，所以他

承包的活都停下来了。还问我们想不想投资。在芦斗寺大殿，遇到一对父子（曲阜当地搞雕塑的，据说在当地很有些名气。）正在工作间息。聊天中，那位王姓老先生说出了自来“曲阜不佛”这句典故。他给出的分析是，曲阜是儒家孔子的地盘，不太适合佛教生长。这位王先生自称，对于佛教及其热爱，山东省内很多佛教寺院都会请他去雕塑和设计佛像，他很热爱这项工作，也很有成就感。他批评“汉人”没有宗教信仰，因此没有什么规矩。据说，在推动曲阜佛教发展的人物中，有一位曾在地方政府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现为佛教居士。曲阜的佛教协会目前正处在筹建过程中。另外，曲阜城内据说已有佛教居士团体在活动。

（四）曲阜的伊斯兰教

公元7世纪中叶（唐朝），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传入中国。明末清初，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从陕西省凤翔县，山东省济宁、邹县、滕县、泗水、泰安等地陆续迁至曲阜，定居城西关者为多，并以此为伊斯兰教的活动中心。雍正初年，在西关始建清真寺，后于道光初年、民国初年进行修葺，时有大殿三间，讲堂四间、水屋两间，前有大门、二门，院内有假山、松柏。常年聘有阿訇、海里凡负责主持宗教活动和民俗事务。伊斯兰教的主要节日有圣纪节、开斋节、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平时，驻地教民每星期五正午先到清真寺沐浴，后着礼服进大殿集体做礼拜，面向西方默诵经文。逢到节日，境内教民均沐浴盛装，到清真寺聚会，相互问候、祝福。圣纪节集体做礼拜，听阿訇念经、讲经、赞圣，捐献“功德”。开斋节在清真寺举行会礼仪式后，一般家庭多备置各种佳肴，宴请宾客。过古尔邦节时，家家把房舍打扫干净，装饰一新，并宰杀牛羊，精制糕点；到清真寺沐浴礼拜，举行节日会礼，参加宰牲仪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去清真寺做礼拜的教民逐渐减少。1958年后，礼拜活动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间，寺内石碑、匾额及部分房屋遭到破坏。八十年代后期，进行修复，因一段时间内寺内未再聘请阿訇，宗教活动一直无人主持。2001年春在原址上西扩复建，主体建筑西殿两层，为阿拉伯式建筑。寺院大门东向，两侧为二层楼房，东南隅建有宣礼尖塔，为伊斯兰教标志性建筑，占地面积为3380平方米。

2012年12月24日，我们课题组一行二人到曲阜西关的清真寺访谈阿訇。先见到看门的一位大爷，他说，曲阜的回族穆斯林现在不怎么重视教门，平日的主麻当地人就有二、三个礼拜的。原来怀疑是因为有青壮年劳力输出，才造成来寺里礼拜的人很少，经阿訇证实，并非因为这个原因，而是教门意识不强。寺里的常住人口就阿訇和看门大爷，有时主麻正赶上阿訇外出有事，就由外来拉面馆的人领拜。现任阿訇已经在寺里工作18年了。镇上的回族

人大多数住在西关，有一少部分在南关，还有一些在农村。

据阿訇讲述，1982年落实宗教政策，但是直到1994年才算真正收回清真寺。之前寺里无人看管，脏乱差，甚至堆放着酒瓶。阿訇晚上回家住，吃饭也是在家，看门大爷晚饭回家吃。寺里无海里凡（在寺里跟阿訇学习伊斯兰信仰的学生）。管理委员会有17人，碍于情面多为内定，他们只有开会时才来寺里。

清真寺门口挂着进寺礼仪的牌子，说明进寺里着装应该文明等等。寺里现有大殿一座，100多平米，男女水房各一个。男水房可供3人同时洗小净、1人洗大净；女水房可供2人同时洗小净、一人洗大净，但是没有热水。曲阜的农村没有阿訇，有回族100人左右。

二楼设有教室，一楼一间屋子可供停放清洗亡人，但曲阜回族人亡人的停放清洗都在家里，没人去清真寺。至于清洗和包裹亡人的工作，阿訇培训了1名沙姓大爷和2名女穆斯林来完成。

清真寺的日常开销靠乜帖和出租门脸的租金，其中乜帖所占比例很小，曲阜也没有人交天课。

寺里有一块中国伊协副会长刘书祥题的石碑，上面写着“以儒释经”，指的是自伊斯兰传入中国，中国古代先贤们（如刘智）融汇儒家与伊斯兰文化，为中国人介绍伊斯兰的事情。

曲阜本地人几乎不会出塞俩目（穆斯林的问候语，祈求真主的平安在你之上），很少会念清真言作证言。几乎没有大小净的概念。无哈吉（去麦加朝觐过的穆斯林）。所以，阿訇讲“沃尔兹”，都是讲一些伊斯兰教最基本的常识。

在服饰方面，曲阜没有戴头巾的，有些来寺里礼拜时戴上，下殿就摘了。但有不少戴小帽的年龄偏大的男人。阿訇节日才穿长袍。镇里、农村都没有穆斯林用品商店。

在饮食方面，清真饭店会卖毛血旺，卖酒，清真肉铺会卖羊血。回族人有很多喝酒的。倒是有清真糕点店，做油香，揪下的面饼一定要用拍的方式使其变圆变大，如果要把油香送给汉族人，则掐下一点点吃掉，把这个有点豁的油香送给汉人。因为曲阜的回族人认为油香不能给汉人，掐下一点真主就允许了。

在住的方面，家里都没有古兰经，照片会悬挂在朝西的墙上，厕所也会朝西。养宠物狗。门口贴着的杜阿，每到春节就像汉人换春联一样也换个新的。饭店倒是几乎都悬挂太思米或清真言一类的杜阿（穆斯林的祈祷词）但也有同时贴财神的。

婚礼方面，1998年以后才有请阿訇念“妮卡哈”写“伊扎布”的，但据阿訇说那只是为了录像时多一个项目好看。婚礼的服装很随意，都是中式的，喜欢穿红色的衣服。有回汉通婚的现象，很少，且基本上是娶汉族女人，回族女人嫁给汉族的更少，且会牵涉丧葬问题，

即能不能按伊斯兰方式下葬。由于当地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阿訇一般都是折中处理，允许葬在回族墓地，但是不给念经了。但家族势力大的，阿訇也给念经。

葬礼方面，如前所述，亡人不在寺里停，也用冰片樟脑，也裹克凡布，葬礼期间亲人穿白孝带，跪经（跪成一圈捧着古兰经传一圈），每个坟坑当地人需花费 500 元买到，外地人需花费 3500 元。殡礼“者那则”（葬礼中穆斯林男人应当礼的拜功）只有几个乡佬给站，其他人不会。像中秋节、母亲节这样的节日，回族也上坟，并且女人可以去坟地。回族人家也讲究修坟，据阿訇讲坟头越来越高，碑也越来越高，竟有两米六的碑。碑上还有雕刻二龙戏珠的，当然更多的是雕刻杜阿的，如太斯米，清真言，求主为我们打开天堂之门等等。如果是父母亡故，碑上会刻上先考先妣字样，如果父母中一人仍健在，则用红笔描色，以示仍健在的意思。

家里有婴儿的也请阿訇给起经名，镇里有给婴儿吹邦克的，农村没有。几乎无割礼，即使有，据阿訇讲也不是为了教门的原因。

当地回族人斋月几乎不封斋，平时的主麻当地只有二、三人参加，斋月的主麻则多一些，能有不到二十个当地人。经常来礼拜的多是外地来做生意的穆斯林以及来自西北在曲阜读书的穆斯林大学生。盖德尔夜能有四、五十当地人来，但也不礼拜，只是送油香，给寺里也帖。斋月阿訇也望月，至于何时入斋月出斋月全看伊斯兰历。当地回族人普遍较富裕，且整体富裕程度高于汉族人，但古尔邦节没有人宰牛或羊。一般就是寺里宰一头牛，当地人算份子，即花钱买若干斤。圣纪时几乎就是当地人来，能有十来人，听阿訇诵经、讲穆罕默德圣人事迹。

当地回族人小孩吓到，有不少请巫婆的，且大人一般不让小孩晚上去寺里，认为寺里晚上灵魂多。而且当地的回族人很重视家谱。

曲阜的伊斯兰教，一方面依托于民族，另一方面依靠着清真寺，而维系着回族的信仰生活和日常生活。从阿訇的角度来看，曲阜的“教门”并不十分兴旺，以至于他会抱怨说曲阜的穆斯林不够虔诚。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曲阜回族的穆斯林信仰却很容易被识别。换句话说，伊斯兰教与佛教、道教、及民间宗教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身份特征。回族的生活方式与他的民族身份一起，成为保存伊斯兰教信仰的重要载体。平日看起来信仰有些怠慢，若遇紧急情况，譬如与外族、外教人发生冲突，曲阜的穆斯林则表现出宗教认同上的高度一致性。

（五）曲阜的天主教、基督教

据曲阜地方志记载，清光绪末年，美国教会在曲阜城西关创建基督教堂，规模较小，教

徒无几。1919年，驻兖州的美以美基督教会在原址上扩建基督教堂，占地五亩，有礼堂七间，会客厅四间，配房七间。先后有3个牧师，但教徒发展缓慢，至1937年仅有二、三十人。抗日战争初期，在城区及董家庄一带发展一批教徒。西关基督教堂平时聚会者有四、五十人，圣诞节期间可达二、三百人。董家庄附近的衡庙村借用民房作教堂，并办起基督教小学。挂“山东省曲阜县衡庙美以美会”的牌子，由西关基督教堂定期拨发活动经费。到衡庙参加聚会活动的教徒多时达150人。同时在朱家村设立聚会点，参加聚会的教徒十五、六人。1945年，衡庙教堂自行关闭，多数教徒弃教务农。是年基督教徒孙天吉到衡庙开设西医诊所，并发展教徒，定期在诊所内活动。到1947年，发展教徒约50名。

1930年，尼山附近的龙泉村始设天主教堂，发展教徒30余人，由驻邹县的德国传教士定期前往传教。两年后，活动自行停止。1933年驻兖州的德国天主教会在曲阜城西关创建天主教堂，占地四亩，有礼堂四间，平房十一间，五间双层楼房一座，并附设“若瑟医院”，隶属兖州天主教会。其神甫、修士、修女均由兖州教区统一派遣，平时，参加礼拜活动的有40余人。抗日战争时期，教徒迅速增加，平时参加礼拜活动的有上百人，节日期间达数百人。1946年曲阜第一次解放，德国籍神甫回兖州，教堂留1名女教徒看守。1947年，兖州天主教会间或派神职人员来教堂主持活动。1948年后，教徒全部弃教，活动停止。

建国后，大多数教徒自动退教，少数教徒活动也不规范。1956年曲阜统战部门与原牧师协商，确定了6名执事和朱家庄、董大城、翟家屯3个聚会活动点。“文革”期间，西关教堂的牧师下放农村，教堂改作他用，乡村3个聚会点也全部取消，少数教徒在家活动。1978年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教徒恢复聚会活动。1985年基督教徒发展到130余人，分布在董家庄、王庄、南辛、息陬、小雪、陵城、吴村等7个区的26个村庄，有执事4人，聚会点4处。此后，教徒日益增多，1990年，全市基督教徒达到1220人，1995年达5000余人。1991年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筹备小组，1995年建立了19个宗教活动场所，1998年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筹委会。

曲阜市现有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多少人？各方说法不一。

据曲阜基督教两会的一位负责人介绍，目前曲阜城乡共有四个天主教聚会场所（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批准注册的堂点），现有天主教徒四、五百人。曲阜还没有类似基督教两会的天主教领导机构。2011年5月20日，祝圣兖州教区主教的任命书上盖有“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印章。祝圣礼在济宁举行。相关政府部门派车接送四个天主教活动点所选出的8位天主教徒出席祝圣礼，于是便有了曲阜现有8个天主教徒的说法。

2012年7月——8月间，我们课题组访问了曲阜城乡的四个天主教活动点，得知曲阜天主

教徒信仰生活中遭遇到的一些困境：曲阜境内没有天主教堂，教徒过宗教生活很不便利。如遇天主教重大节日，曲阜的天主教徒只能到兖州的天主教堂庆祝。同时，由于缺少神父，曲阜城乡的天主教徒最重视的“告解”圣事不容易得到解决。另外，天主教徒若遇生老病死等大事需要神父帮助，也不容易得到满足。

曲阜基督教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在2011年至2013年的三年间，我们课题组几次进驻曲阜，了解曲阜基督教会生存状况，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目前，在曲阜城乡，属于基督教“两会”系统的活动堂点（在主管部门登记注册的）有26处，受洗信徒人数在5000人至6500人之间。在访谈曲阜基督教会各堂点负责人时，我们得知，在“三自”之外，曲阜还活跃着基督教的另一类教会和团契组织。目前，在这类教会和团契聚会的信徒人数在2500-3500左右。聚会点分散在曲阜城里和乡村的六、七个地方。

在曲阜有组织的宗教信仰中，基督教近年来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宗教力量。在曲阜当地人的印象中，基督教发展很快，人数很多，影响很大。在曲阜城乡调研期间，无论走到哪里，要打听基督徒的聚会点，并非难事。在曲阜民众眼中兴旺发达的基督教，在曲阜基督教会的领袖和普通信徒的感受中，又是怎么样的呢？在曲阜，我们每到一处基督教活动点，几乎都能够听到信徒们这样的诉说：1、跟山东省内其他地区相比，曲阜基督教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一个最突出的困难是牧师严重缺乏。宗教活动恢复自由以后，直到2011年，整个曲阜市基督教两会只有一位按立圣职的副牧师——称作教师。2、曲阜城乡的26个基督教活动堂点大多设在民居当中，设备简陋，教牧资源严重短缺。3、农村教会内的宗教气氛跟从前相比，变得不太浓厚、热烈。信徒似乎不愿意抽更多时间用于教堂内的宗教敬拜。4、普通信徒很少有机会参与重大宗教事务的决策，与教会领导层的关系渐趋疏远。5、在农村聚会点带领人的印象中，曲阜基督教会已经进入一个“停滞期”。随着老信徒慢慢离世，新的信徒补充不进来。各堂点负责人感到“福音”传不动。

三、曲阜六大宗教的关系模式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是研究中国社会宗教文化生态和基本社会结构的经典著作。他自己解释说，《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和他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

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④

费孝通先生研究发现，中国基层传统社会是一个按照血缘、地缘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所建构起来的注重等级身份的“熟人社会”。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一个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就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中国人最重视的人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按照《说文解字》的注释，“伦”有两层含义：类也；辈也。伦重在分别和差等，所谓伦理，讲究的就是各有位分和差等的次序。在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政权变迁中，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但是费孝通所发现的基于中国作为乡土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模式和社会结构特征却保持着基本的稳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中国性”：一个强调身份差别、依靠人情和等级身份制运作的礼治社会。我们所研究的曲阜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乡土中国的一个微缩景观。

当我们把曲阜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基层社会单位，来考察曲阜地方如何组织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活时，我们发现，人们确实是按照上述秩序和模式处理一切问题的，包括处理合作与纷争的问题。

对于曲阜这样一个孔氏族裔占总人口五分之一、文盲与半文盲占总人口近20%、农业人口占到87%的农业县来说，虽然经历了从封建王朝到民国、从民国到新中国的剧烈社会变迁，然而，曲阜仍然具备费孝通所考察的“乡土社会”的一些基本特质。

新中国成立以前，孔府作为“天下一家”、富甲曲阜一方的大家族，其在曲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曾扮演过无可取代的“领导”角色。曲阜差序格局的中心正是孔府。按照与孔府关系的远近，曲阜社会组织起其日常生活的关系形态。如果遇到处理与外来者的关系，一般说来当然由孔府出面代表曲阜地方利益，提出交涉。仅举一、二例为证：早年修铁路，要经过曲阜，孔府代表地方出面干预的结果是，迫使民国政府的铁路修筑计划改道。孔府的理由是担心破坏“圣地”的“风水”。第二例是，当得知美国传教士要在曲阜泮池购置土地建造基督教堂的计划时，孔府也是当仁不让地代表地方与各方斡旋，结果迫使美国传教士的建堂计划搁浅。

孔府作为曲阜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主要担纲者，在组织曲阜当地社会生活，维系日常生活的关系和秩序方面，确曾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天主教和基督教进入曲阜之前，孔府所领导的曲阜乡民社会，在宗教信仰的选择和宗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教身份认同方面，并无严重冲突。曲阜乡民包括孔府，其日常宗教生活的内容无过于：一、祭祀祖先（以家族为单位，按照“非其神不敬”的原则加以组织）；二、到道教、佛教和民间宗教中寻求宗教服务：祈福禳灾、祈求平安、安顿亡灵、祈求神佑和子嗣等等。恰恰是在这两点上，孔府与当地底层民众的宗教生活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支持我们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作为曲阜地方社会生活主要担纲者的孔子后裔，并没有为曲阜提供一种特别的宗教供应或宗教服务。甚至他们自己也要向其他宗教求助，以满足其宗教生活的各种需求。换句话说，孔子-三孔-儒学-儒教，并不曾作为一种宗教参与曲阜地方的宗教竞争，从而发挥宗教信仰的功能。儒学-儒教作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宗教”（或哲人宗教），其在曲阜当地，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功能：一方面是为社会统治提供了一整套具有超越性的伦理观念——像仁、义、礼、智、信等等；另一方面是避免了社会日常生活陷入巫术性宗教或纯粹巫术迷信的桎梏当中。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精神，并没有禁锢人们的宗教需要，也没有扼杀曲阜人对于神灵的信仰，以及对于一切未知领域的事物，或各种超自然的神灵鬼怪保持警惕、畏惧、敬虔、邀宠等宗教感情。只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巫术性宗教所带来的痴迷和狂热。受孔子-儒学-儒教的影响，曲阜乡民社会的宗教生活，在日常状态下呈现出温情、冷静、闲适的特点。无论是祭祀祖先，还是向各路神仙、灵异、鬼怪、精灵献祭，都不会有过于激烈的行为——人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据传，即便是用“人偶”献祭或殉葬，都会遭到孔子及其后学的强烈反对。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引发乡民社会激烈冲突的现象，也实属罕见。

2、从典型的意义上说，为曲阜地方提供宗教服务的组织，在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一神信仰的宗教进入曲阜之前，只有佛教、道教、民间宗教。换句话说，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佛教、道教、民间宗教作为曲阜主要的宗教供应者，参与到曲阜的宗教竞争当中。其特点是：A、三家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B、朝廷或官方立场作为风向标，时常会影响三教的兴衰、强弱。C、三方都不要求信众有明确的身份皈依，因此，在民众选择这三种宗教时，没有排他性限制。所以，在日常生活状态下，曲阜乡民可以同时向这三种宗教寻求帮助，而丝毫不会感到内心的冲突与挣扎，更不会受到乡邻的责怪与歧视。换一个角度来看，由于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在提供宗教服务时，其“宗教产品”的功能具有相似性，因此，这三种宗教之间的关系便具有互补性，而非替代性。不知道这三种宗教中的哪路神灵会显发功用，所以乡民的机智便表现在都会拜一拜。就像今天的炒股票，不知道哪只股票会赚，那就尽量多投资几种。总之，无论是从宗教的供应方来看，还是从需求方来看，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在服务曲阜宗教生活方面最大的特点是，没有造成“身份”上的冲突与紧张关系。

3、伊斯兰教的情况又是另外一种情形。由于伊斯兰教进入曲阜的路径比较特别，回民得以在曲阜定居、聚居，是因为皇帝的救命。所以，当伊斯兰教这种明显属于外来的宗教进入曲阜时，并未遇到孔府的反对和阻挠。作为一神教的伊斯兰教之所以在曲阜未引起强烈排异反应，还有一个原因是，它只在回民当中传播。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身份（信徒）和回民身份（民族）是叠合在一起的。因此，当伊斯兰教成为曲阜的第四个宗教参与宗教供应方面的竞争时，由于事先划定了它的“市场份额”，所以，等于无需参与竞争。长期以来，曲阜的伊斯兰教就这样跟曲阜的其他宗教及曲阜的孔子-儒学-儒教保持着近乎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曲阜的伊斯兰教，事实上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增加与曲阜地方文化的亲和性。譬如，在西关清真寺的院子里，矗立着一块十分醒目的碑刻，上书四个大字：“以儒释经”。按照阿訇的解释，这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教的明智之士所发明的释经原则，而且确实有拉近与儒家关系的用意。再进一步说，拉近伊斯兰教与儒家的关系，旨在表明虽然回民信仰的是一个神，穆斯林也不准拜祖先，但是，与汉民的宗教信仰和习俗相比，伊斯兰教徒不过是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罢了。也正因为曲阜的伊斯兰教徒看重其生活方式过于其宗教信仰本身，甚至有时候看重其民族身份也过于其宗教信仰，所以，回汉之间即便是会为“猪肉”这类事情发生冲突，也基本上不会因为“神灵”的事情而存在紧张关系。更多情况下，当地回民会为受到不友好待遇而与当地民众起冲突。

4、跟整个山东的情况相比，天主教和基督教进入曲阜比较晚。天主教与基督教进入曲阜，乃至整个中国的路径也比较特殊。由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这两个外来宗教，给曲阜乡民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与其说是基督宗教信徒的一神信仰与当地乡民多神信仰的冲突，倒不如说是宗教身份认同所引起的高度紧张关系。一方面，与伊斯兰教相比，天主教和基督教一旦进入曲阜，便展示出其面向整个曲阜乡民社会传教的姿态。不受民族身份限制，只要是愿意相信传教士所传讲的“福音”和“真理”，就可以加入教会，获得教徒的身份。另一方面，与之前的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相比，天主教和基督教不但在信仰和教义上明确强调其严格反对上帝之外的一切“假神”和“偶像”崇拜；而且在其信徒的宗教身份上严格排斥信徒同时向多种宗教“委身”。这样一来，由于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上述信仰和身份两个方面要求信徒“分别为圣”，其所造成的冲突和紧张便是不可避免的。这倒不是说，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进入，是造成曲阜宗教冲突的根源，而是说，像天主教和基督教这样两大宗教组织作为新的宗教供应方，参与到曲阜宗教生活中去的时候，给曲阜的宗教竞争带来了不同的挑战。从统计数字看，经过了八、九十年的努力，曲阜的天主教和基督教通过与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甚至还有伊斯兰教的宗教竞争，在曲阜争取到了一万多人加入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以曲阜

64万总人口计，天主教徒加基督徒占曲阜总人口的比例为1.56%。要怎么样看待这个数字？判断者按照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否意味着曲阜的宗教生态已经失衡？这又需要在“平衡”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

事实上，透过观察曲阜天主教徒，尤其是基督徒在整个“曲阜建堂事件”中的表现，我们发现了一个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这两大宗教信仰徒与曲阜乡民社会所建立起来的人情和关系模式。

自从新中国的各级政府取代孔府扮演曲阜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担纲者以来，政府无疑成为了曲阜新的“中心”。政府的立场和决策不但是曲阜社会生活的坐标，也是其方向指南。在社会生活的这个新坐标体系中，曲阜的天主教和基督教逐渐脱去了教会的“外国”和“西方”背景，而融入到曲阜乡民社会的秩序格局当中。文化大革命期间，曲阜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驱逐各种宗教（曲阜的六大宗教无一例外，都在取缔之列），遣散宗教神职人员。曲阜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像其他几个宗教一样，启动的同样是一种“顺从模式”。在曲阜成长起来的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并不熟悉西方的价值观念，更不会使用西方的人权理论来捍卫作为宗教信仰徒的信仰权利。顶多，他们会避开政府和乡邻的视线，在某个信徒家中悄悄聚会，而从不公开与政府发生争执和冲突。1982年政府自动落实宗教政策，决定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和返还一部分宗教财产。曲阜的各大宗教做出的一致反应仍然不出乎其一贯的“顺从模式”。在政府政策的允许和鼓励下，曲阜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试探性地、有节制地启动了新一轮的发展计划，建造教堂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曲阜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建堂计划，曲阜地方并无反对和阻挠的势力，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人们似乎没有理由反对和阻挠。文革时期砸教堂、开放时代建教堂，这在曲阜当地人看来都属合理、正常。耐人寻味的是，当曲阜基督教堂的建设遭遇来自曲阜之外的力量干预，而被迫进入无限期停滞状态时，曲阜基督徒仍然不会启动来自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人权理论，与地方政府及其上级、再上级主管部门公开论争，甚至也不会自觉寻求来自国内外舆论的支持和支援，更不会向任何具有反华立场的机构和组织寻求帮助和支持，而是坚持采用曲阜乡民社会所熟悉的人情和关系模式，寻找机会影响政府主管部门的分管领导，请求其下达指示，从而重新启动曲阜基督教堂的建设。

从这里看到，曲阜基督徒（天主教徒也一样，在我们调研的三年当中，曲阜的天主教徒一直**等待着**在政府批给他们的一块土地上建天主教堂）处理冲突的方式，以及所采取的路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十分符合曲阜乡民社会的人情关系模式和结构秩序格局。按照这个关系模式和秩序格局的特点，冲突双方不会坐下来，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彼此的纷争和冲

突。据说，自从曲阜建堂事件发生以来，曲阜的基督教徒从未寻求过与儒学-儒教代表人物或组织进行对话和沟通。而是双方都走“上层路线”，企图通过干预政府决策，影响事态向着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方向发展。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曲阜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已经融入当地社会而成为曲阜地方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能否与曲阜其他宗教文化和谐相处，并不取决于他们所提供的宗教服务是否与曲阜的其他宗教相同，而是取决于政府对于各种宗教间关系的调整和控制能力。换句话说，政府的正确立场和合理决策是保证曲阜各宗教间和谐相处和良性竞争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在曲阜，包括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内的各种宗教信徒，无论其宗教身份认同是多么样的不同，在其作为中国公民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尤其是在认可和服从政府立场和决策这件事上，没有明显分歧。

在对曲阜各种宗教信徒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每一种宗教信徒都希望得到政府政策的平等支持，并不格外期待政府针对自己宗教的特殊优惠和恩赐。

结语：

1、每一地的宗教文化，都有一个长期形成和演变自然过程。民国以来，曲阜已经逐渐形成了多种宗教文化共处一地的自然生态格局，各种宗教之间并无大的冲突记载。因此，我们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和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继续自觉维护曲阜历史上所形成的这种多元宗教文化并处、共存的格局。政府主管部门不需要在曲阜现有的六大宗教（民间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之间有选择性地扶持或排斥。一视同仁地对待曲阜六大宗教，让它们在满足曲阜民众宗教需求方面自由、公开地竞争。“自由”的好处是，使宗教充满活力，真正起到安定人心、净化灵魂、使人向善的教导和教化作用；“公开”的好处是，让宗教运行在阳光下、社会公众的视野中，以避免宗教极端化、邪教化。

2、“三孔”文化是曲阜地方文化的特色，也是曲阜乃至中国最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之一。建议党和政府主管部门按照国家统一的文化发展战略，在人、财、物诸方面继续支持曲阜的“三孔”文化和与之相关的儒学或儒教的发展，使之成为真正的儒家文化圣地。我们研究发现，曲阜的六大宗教信徒并不排斥“三孔”文化，甚至对孔子-儒学-儒教都有相当高程度的尊重和认同。

3、我们调查发现，曲阜多数民众并不把“三孔”文化和儒学-儒教当作“宗教”来看待，因此，似乎并不存在一个以满足宗教需要为目的的“儒家信众”群体。因此，它跟曲阜

六大宗教之间并不构成真正的竞争关系，更不是有你没我，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所以，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在国家法律和宗教政策的范围内，放心大胆地为曲阜宗教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具体到曲阜“圣三一”基督教堂建设一事，我们认为，基于国家法律、宗教政策的允许和认可，在曲阜建设一座基督教堂，并不会引起曲阜宗教之间的冲突。至于基督教堂的设计方案、建筑高度、距离孔庙的远近等等技术上的细节问题，可以由政府主管部门出面组织相关人员当面沟通、协商，以达成妥协性意见。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调解纠纷、解决矛盾、促进合作、构建共识。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在处理曲阜建堂事件这类冲突中，扮演更积极主动的角色。

4、在设计曲阜的文化、节庆、国事活动方面，应充分考虑曲阜地方的财政、精神负担问题，充分照顾各方利益。换句话说，真正保护曲阜地方文化资源，并使其发扬光大，需要当地民众充分、广泛、自觉地参与，不能只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唱独角戏。